

Peter Gay

[美] 彼得·盖伊 / 著

刘北成 / 译

THE
ENLIGHTENMENT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启蒙时代

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

(上)

文
景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Peter Gay

THE ENLIGHTENMENT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启蒙时代 (上)

[美] 彼得·盖伊 / 著
刘北成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美)盖伊
(Gay, P.)著;刘北成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书名原文: 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ISBN 978-7-208-12576-6

I. ①启… II. ①盖… ②刘… III. ①启蒙运动—研
究—欧洲 IV. ①B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9714号

责任编辑 雷静宜

装帧设计 水玉银文化



世纪文景

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

[美]彼得·盖伊 著

刘北成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4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20 毫米 1/16

印张 35

插页 4

字数 424,000

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2576-6/K·2283

定价 79.00元

译者序

本书作者彼得·盖伊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1923年，盖伊生于柏林一个犹太人家庭。为逃避纳粹迫害，他们一家在1939年逃离德国，历经坎坷于1941年才抵达美国。1947年和1951年，彼得·盖伊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自1948年起，他在哥大先后就任政治学和历史学教席，1969年转至耶鲁大学，1993年退休。彼得·盖伊是一个高产的学者，发表专著20多部，尤以欧洲文化史、思想史研究著称于世。

《启蒙时代》是彼得·盖伊凝聚前半生的人生经验和学术观照的心血之作。盖伊的启蒙运动研究，不单纯是出于学术志趣，更有深层的精神关切与追求。据他自述，他的父亲就是启蒙思想的服膺者，他从小亦受到父亲的无神论和世界主义思想的熏陶，纳粹的种族迫害更使他坚定了世界主义的信念。在哥大期间，他潜心于启蒙运动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著，最终推出了两卷本的《启蒙时代》。

要更好地理解彼得·盖伊这部《启蒙时代》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有必要把该书放回到启蒙运动学术史的脉络里。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自我命名的。牛顿在力学和光学领域的突破性成就不仅成了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源泉，而且也提供了启蒙运动的一个主要隐喻：光明。启蒙哲人使用光的隐喻，呼唤光明，传播光明，用光明来驱逐黑暗。“启蒙”一词在法文和英文里都源于“光”，法文是*lumière*的复数*lumières*，英文是*light*的动名词*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由此得名。自我命名也是自我理解和自我阐释的。光或光明代表智慧、开明、理性、自由，最重要的是代表了批判思维，与之相对的黑暗则意味着愚昧、守旧、盲从、专制和宗教偏执。18世纪中叶，达朗贝尔为《百科全书》撰写的绪论既是启蒙运动的一份纲领性文献，也可以说是一份启蒙运动的中期报

告。达朗贝尔写道：“这部全书有两个目的：既名为百科全书，就须将人类系统的知识及其他有关知识一并论述；既是科学艺术各方面的全书，自应将科学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原则与细则俱备。”

当然，如同《百科全书》本身的命运一样，启蒙运动始终伴随着争议，不时遭受责难、压制乃至迫害。18世纪80年代，启蒙运动已接近胜利的尾声，乐观的情绪渐成主流。欧洲君主普遍以“开明”自居，许多参与或标榜启蒙的学者也进入荣耀的学术殿堂。此时，德国《柏林月刊》就“什么是启蒙（运动）”展开了一场讨论。康德在一篇著名的短文中给启蒙运动下了一个最著名的定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康德还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但不是一个已经启蒙的时代。

康德振聋发聩的立论既是对启蒙运动的总结，也成为启蒙运动研究的肇端。很显然，如何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既关涉事实界定，也突显出不同的历史意蕴和价值取向。康德以降的200多年来，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和评价涨落起伏，始终是各个时代重大思想论争中的焦点之一，并且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

大体上看，启蒙哲人的身后毁誉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评价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

首先是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相继发生，人们很自然地认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法国大革命不仅引发了思想界的大分裂，也促成了启蒙运动的结束，把启蒙运动变成了一个大问号。尽管不乏以启蒙之子自居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是革命恐怖也引发了巨大的惊惧。启蒙哲人，要么某些人要么全体，被视为造成流血的罪魁祸首，受到追究和抨击。早在1790年，保守主义之父爱德蒙·伯克就抨击法国大革命沦为一场大灾难，诟病启蒙哲人将自由作为孤立的形而上学抽象，消弭了个人价值抉择和传统所蕴含的经验智慧。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也认为，启蒙是一种否定一切的绝对观念，在可怕的现存社会状况中有其正当依据和批判功用，但

就实践结果而言,则与恐怖有直接相关性。随后兴起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浪潮更是一度把启蒙运动湮没在忘川里。

其次是极权主义。进入20世纪,启蒙运动研究逐渐升温,对启蒙的评价再次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分化。第一部系统深入的研究专著是德国犹太裔学者恩斯特·卡西勒的《启蒙哲学》。关于这部经典著作的评价,可以参见彼得·盖伊在本书文献综述中的论述。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启蒙哲学》的价值不仅仅在学术层面。正如彼得·盖伊在《启蒙哲学》新版前言中指出的,该书发表于1932年,正值法西斯主义猖狂崛起之时,这就使得该书具有了特定的时代色彩和价值。卡西勒重申了康德的论断,从而有力地捍卫了启蒙理想,即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同类作品还有法国学者保罗·阿扎尔的《18世纪的欧洲思想:从孟德斯鸠到莱辛》(1946年)等。

同样是试图从思想上回应极权主义,一些西方学者对启蒙运动做出了相反的解读。就在《启蒙哲学》出版的同一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发表《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认为启蒙运动不过是用理性的乌托邦取代宗教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的变形在当代仍在重演,人类前景不容乐观。流亡到美国的法兰克福研究所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1944年)中把法西斯主义归因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倒退,进而追溯到启蒙的异化、蜕变和局限。“二战”结束后,极权主义的话题在“冷战”背景下进一步发酵。耶路撒冷大学教授、波兰犹太裔学者塔尔蒙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1952年)曾轰动一时。该书把民主分为自由/经验型民主和极权/救世型民主两种类型,把一些启蒙思想家尤其是卢梭视为极权/救世型民主的思想来源。

第三个主题是现代性。在“冷战”背景下,现代化理论兴起,现代化成为西方宏大历史叙事的主线。在西方历史教科书的标准叙事中,启蒙运动被描述为西方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或者说,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创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种现代化启蒙运动论的主要倡导者就是本书作者彼得·盖伊。

盖伊坦承,《启蒙时代》承继了卡西勒的《启蒙哲学》的基本精神。不

过,卡西勒的《启蒙哲学》囿于哲学史或观念史的传统,盖伊则试图把启蒙运动置于更宏大的西方思想史和社会史背景之中。《启蒙时代》由《启蒙时代(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1966年)和《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1969年)两卷构成,全书按照辩证的三个主题展开论证:对古代的追慕(正题)、与基督教的矛盾(反题)以及现代性的追求(合题)。针对贝克尔、塔尔蒙等人对启蒙运动的贬抑,盖伊明确把启蒙运动与当时学术界热议的“现代性”正面联系起来。他认为启蒙哲人发扬光大了古代的理性、批判精神,提出和阐释了丰富的新思想,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乃至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均有筚路蓝缕之功。

盖伊为写作《启蒙时代》,剔抉爬梳了大量启蒙哲人的经典文本和研究文献,可以说为现代化启蒙运动叙事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学术基础。尽管有年轻气盛的挑战者(如罗伯特·达恩顿)讥讽其没有使用档案,称之为读书笔记的汇编,但是这部著作气势恢弘、视野阔大、征引广博、述论融通,很自然地得到了学界的赞赏。第一卷出版后,旋即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

盖伊的《启蒙时代》对于推动新一波启蒙运动研究热潮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该书受到赞赏和追捧,成为后来研究者登堂入室的指南。同时,该书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甚至成为攻击的靶子。

大致说来,批评主要来自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社会哲学层面。盖伊的《启蒙时代》把启蒙哲人解释成宗教的敌人,引起了保守派的愤慨,因此被列入“20世纪50部最糟书籍”之一。与此同时,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兴起,现代性受到盘诘,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受到质疑,启蒙运动则首当其冲。当然,后者的批评不仅是针对盖伊的,甚至不是以盖伊为主要论战对手。但是,争论的焦点是现代性和现代化,盖伊的启蒙运动观也必定受到波及。

第二个是历史研究层面。盖伊的研究方法和许多结论都受到挑战。譬如,盖伊把启蒙运动视为一个整体,把启蒙哲人归为一个家族。这种整体论不能说服强调启蒙运动存在深刻分歧乃至分裂的学者。此外,那种强

调不同国度里启蒙运动民族特色的倾向也渐成气候,从国别角度研究启蒙运动的成果不断涌现。再如,盖伊局限于经典文献和研究文献的研究思路也受到质疑,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以及社会史、书籍史的大步进展使启蒙运动的画面几乎焕然一新。最后,盖伊认为,启蒙哲人(如伏尔泰)在政治上是非常激进的,启蒙思想是美国革命乃至法国大革命的先导。这是最受人诟病的两个结论。学界普遍认为,伏尔泰等启蒙哲人在政治上是温和的,并不支持民主政治。至于启蒙与革命的关系,则需要寻找其中的联系环节,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美国学者达恩顿等人做了破解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启蒙运动研究领域新作迭出,盖伊的《启蒙时代》的经典地位也在争议中得到确立。盖伊的学术成就获得了美国和欧洲学界的广泛尊重;盖伊的启蒙运动研究及其核心观点,即现代化启蒙运动论,作为一家之言,目前依然具有重要影响。

评论者通常称赞盖伊的《启蒙时代》学识厚重、见解睿智,而且文字生动、雅俗共赏,极具可读性。在译者看来,该书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那就是:盖伊是以启蒙的精神来论述启蒙运动的。盖伊虽然推崇启蒙运动,但没有神话启蒙哲人。重要的不是曝光启蒙哲人的私生活,而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原生态的文献,把启蒙哲人的著作当作历史语境中不断摸索试探的话语,而不是现代神谕。就算是“读书笔记”吧,我们看到,盖伊旁征博引,夹叙夹议,点评争辩,有一种与启蒙哲人平等对话的味道。可以想见,读者加入这样的对话,收获的不会仅仅是知识。

刘北成、王皖强

2014年9月8日

本书是两卷本著作的第一卷。这两卷著作既独立又相互联系，合在一起，试图对启蒙运动提出一个全面的解释。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思想史研究者、文学研究者和政治理论家极力恢复启蒙运动的真实面目，清理诋毁者和颂扬者两方面的不实之词。他们出版了权威性的新版经典文本，发现了新的文献，编辑了完整准确、令人耳目一新的启蒙哲人通信集。当然，他们并不满足于这种技术性的基本工作。自从伯克和德国浪漫派大加讨伐以来，一直有人认为启蒙运动应该对现代的种种邪恶负有责任，而且嘲笑其所谓肤浅的理性主义、愚蠢的乐观主义和不负责任的空想主义。与这些曲解相比较——这些曲解比他们主张铲除的错误更肤浅、更愚蠢、更不负责任——自由派和激进派人士对启蒙运动的赞美虽然也带有漫画性质，却是亲切而无害的。左派的天真远远抵不过右派的恶毒。另外，与保守派的观点相似，自由派的启蒙运动观也同样不能让人满意，有待修正。因此，学者们展开了争论。我也参与其中，特别是与右派进行交锋。我的确喜欢这种论战。但是，现在应该而且可能从论战转向总结了。

总结就需要考虑事物的复杂性：启蒙运动的那些人在理论、秉性、环境和代际方面都有差别。鉴于他们的思想五花八门，以及他们之间时而发生的激烈争论，许多历史学家甚至不想再探索启蒙运动的统一性。休谟是一个保守派，孔多塞是一个民主派，俩人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霍尔巴赫嘲笑一切宗教，莱辛实际上想发明一种宗教，俩人有什么共同之处？狄德罗因嫉妒而蔑视古物研究家，吉本则欣赏和模仿他们，俩人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卢梭崇拜柏拉图，杰斐逊却拿着《理想国》无法卒读，俩人又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我认为，如果被这类问题迷惑，那就会陷入一种令人绝望的唯名论，就会把历史研究变成传记写作，就会为了多样性而牺牲统

一性。上面这类问题是有价值的,但是其主要价值是纠正研究中的偏差:即防止历史学家为了追求统一性而牺牲多样性,使之不要陷入简单化的解释。所谓简单化的解释是指把启蒙运动当作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一个理性时代,从而把狄德罗的生机论、卢梭对情感的推崇、休谟的怀疑论都视为外在于启蒙运动的东西,看作是浪漫主义的先声。这是一种削足适履的界定:先是剥夺启蒙运动的丰富内容,然后又抱怨启蒙运动乏善可陈。我不会采用这些做法。本书将承认启蒙哲人的差异,因为正是这些差异给启蒙运动提供了许多活力,构成了其内部历史的许多内容。但是,因为泛指的名称并非柏拉图的理念,而是将有意义的相似性归纳在一起的范畴,所以我将始终使用“启蒙哲人”(philosophes)这个名称,把他们的思想、策略和生平活动统称为“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而且我还用这些名称表示我所谓的一个家族,即用某一种思想方式联系起来的一群知识分子。

xi 虽然启蒙运动是由一群启蒙哲人构成的,但不止于此。它还是一种文化氛围,一种社会环境:启蒙哲人在其中活动,从中发出反叛的鼓噪,也从中悄悄地获得许多思想,同时还试图对之推行自己的改革纲领。但是,启蒙哲人的社会环境,他们的18世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他们斗志昂扬地介入他们的时代,从而使他们得以融入某些最深刻的潮流,但也会使他们对某些不利的现实不闻不问。我发现,因此关键在于不仅要理解启蒙哲人的思想及其与周围世界的互动,而且要判断他们在认识上的优长与缺陷。杰斐逊说的有道德的罗马共和国与20世纪学者说的罗马共和国一样吗?休谟笔下的西塞罗与我们眼中的西塞罗一样吗?启蒙哲人所谓的“文学复兴”(the revival of letters)与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是一回事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促使我从思想史研究进入社会史研究,努力探讨启蒙哲人建构和感受的启蒙运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今天当作一个历史事件来看待的启蒙运动一样。

由于我的首要兴趣在于思想与现实的碰撞,因此我很自然地把启蒙哲人的经历当作我的主要关注点和我的解释中心。我发现,启蒙哲人的经历乃是争取独立自主的辩证斗争,是消化他们继承的两种遗产——基督教遗

产和异教遗产——的尝试：使之相互对抗，从而确保它们各自独立。启蒙运动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批判与权力。伏尔泰曾经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他懂得如何去恨，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去爱。其他启蒙哲人也使用破坏性的批判来为建设清理出场地，因此批判本身就成为一个创造性角色。正如恩斯特·卡西勒指出的，启蒙运动“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把批判功能与生产功能结合起来，并且使两者直接地互相转化”。

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显示的，我认为，启蒙哲人的反叛成功地达到了两个目的：他们的反叛乃是用一种异教反抗其基督教遗产，他们依赖的是古代的异教；但是他们的反叛也是一种从古典思想和基督教教条下解放出来的现代异教。古人教会启蒙哲人使用批判的武器，但正是现代哲学家告诉他们权力具有的种种潜能。在本书中，我将研究启蒙哲人接受的教育：我将追溯批判如何从它在古代异教时代的繁荣和上千年间基督教时代的衰落转向在文艺复兴时期和16、17世纪的重新崛起。我在这一卷里说的“对古代的追慕”和“与基督教的矛盾”乃是在启蒙运动的激进纲领逐渐形成的辩证过程中的两个因素。在第二卷中，我将讨论这种激进纲领，这种斗争的合题——“现代性的追求”。因此，这两卷书乃是同一主题下的两个部分，分别展开分析，但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第一卷里，我将论述启蒙哲人如何争得了自由；在下一卷里，我将论述他们如何运用这种自由。

xii

本书的写作是从1959年开始着手的，也可以说从1944年就开始了，当时我在丹佛大学读本科，开始对休谟产生兴趣。1959年我发表了专著《伏尔泰的政治观》。在此之前和之后写的许多东西都为本书做了准备。因此，本书的完成不仅受益于其他许多学者，也包含我本人的积累。如果读者发现某个句子或观点似曾相识，那是很自然的。对于我自己以前的论述，凡是我认为既难以改动又必须引用的，本书就移植过来。

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这两卷著作都题献给她。她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也不喜欢作者把一切灵感和成功都归功于妻子的热情辞藻。我赞同和欣赏她的这种态度，但是作为一个职业历史学家，我必须秉笔直书。

没有她,我不仅不能完成本书的写作,而且不能这么迅速、这么顺利和这么愉快。她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了全书各个章节,有些部分阅读了几遍。她对各个部分都提出了尖锐而宝贵的意见。阿瑟·威尔逊和罗伯特·韦布分别认真审读了每一章,所提意见十分深刻。查尔斯和汉娜·格雷阅读了最初的几章,所提建议对于澄清一个重要问题非常重要。威廉·布斯马同我多次进行有关宗教与批判的关系的讨论,对于我修改第四章和其他部分帮助甚大。海伦·培根以其训练有素的古典学学者的眼光对前面几章进行了审读。罗伯特·帕尔默长期以来让我受益良多,这次也敦促我认真考虑启蒙哲人与其基督教环境的关系;他的指教既严厉又具有建设性,其成果主要体现在第六章。在过去15年里,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几乎阅读了我写的全部东西,给予我持久的帮助;他读了本书的初稿。初稿与完成稿有天壤之别,他的功劳不可低估。

在过去几年里,我与一些朋友谈论本书的写作。亨利·罗伯茨特别耐心地倾听我的想法,对我的“灵感”特别宽容,毫不吝惜地给我鼓励。我要感谢鲁道夫·比尼恩在我写作初期提出的唯名论批评,促使我对我提出的启蒙运动整体论做更周密的论证。关于古典古代在启蒙运动里的核心作用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我在1959年和1960年与已故的沃尔特·多恩的几次令人兴奋的交谈。此外,我还感谢与下列各位的讨论:格雷恩·布林顿、列奥·格肖依、比阿特丽斯·霍夫施塔特、欧文·克里斯托尔、格特鲁德·希默尔法布、克里斯托尔、赫伯特·马尔库塞、奥雷斯特·拉努姆、弗里茨·斯特恩和约翰·威廉·沃德。雷蒙德·格鲁和理查德·韦伯斯特在有关意大利启蒙运动方面,给了我有益的建议。

我非常荣幸曾经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有关18世纪欧洲文化的教授研讨会;1962年秋季,该会设立之初,我发表了这两卷书的核心论点——启蒙运动的辩证法——然后在两年的热烈讨论中让这个论点受到检验、批评、修正和补充。我特别感谢参加研讨的同仁,他们是詹姆斯·克利福德、奥蒂斯·费洛斯、阿伦·黑曾、H.琼·赫克特、艾伯特·霍夫施塔特、保罗·亨利·朗格和鲁道夫·威特科尔。我的几个学生也给我提供了一些

精彩的语录和有益的批评,我特别感谢杰拉尔德·卡瓦诺、斯蒂芬·克恩和维克托·韦克斯勒。虽然我几乎是独立完成这项研究工作的,但两名研究生帕特里夏·拉文德尔女士和奥古斯塔斯·帕洛塔先生也在挖掘意大利资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

在本书写作期间,我有机会通过演讲来检验书中的一些想法;准备讲稿和在讨论后进行修改的过程对我也有很大裨益。在此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兰戴斯大学、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瓦萨学院、明尼苏达大学、纽约大学、艾姆赫斯特学院、弗吉尼亚大学的演讲主持人和聪明的听众。此外,我在芝加哥的美国历史学会和罗切斯特大学的法国历史学会上宣读了论文,得到了一些令人兴奋的批评意见。

xiv

我还要感谢一些物质方面的帮助。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邓宁基金会给我提供了研究基金和必要的图书。如果没有美国学术团体协会在1959—1960年提供的适时而慷慨的研究职位(我的任务是研究现代性在18世纪的胜利;这项工作在我完成本书第二卷后才完全解除),我就不可能开始写作这部大书;如果没有1963—1964年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提供的研究职位,我不可能那么愉快地写出本书的许多篇章。这个中心是摆脱日常杂务的最佳避难所,受到许多人的热烈赞扬。我只想补充一句话:那些关于中心的动情词句、那些感人的笑话都是名副其实的。我在那里的一年工作进展顺利,为此要感谢拉尔夫·泰勒、普雷斯顿·卡特勒和简·基斯梅耶尔。我还感谢中心的秘书琼·沃姆布鲁姆。在帮我打字的人中,特别感谢爱恩·瑟维特。她热心、细心,还监督了其他人的打字工作。最后,本书杀青正值艾尔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50周年社庆,能与这样伟大的出版社合作,我倍感荣幸。同时,我要感谢本书编辑帕特里克·格雷戈里,他对我的行文风格加以宽容。但愿其他编辑也能与他一样。

彼得·盖伊

1965年11月于纽约市

目 录

序 曲 启蒙运动的世界

- 一、一小群启蒙哲人 1
- 二、表象与现实 16

第一篇 对古代的追慕

第一章 有用又可爱的过去

- 一、希伯来人和希腊人 29
- 二、意气相投 36
- 三、寻找异教：从自比古人到自我认同 55

第二章 第一次启蒙运动

- 一、希腊：从神话到理性 67
- 二、罗马的启蒙运动 87

第三章 批判的风气

- 一、批判即哲学 118
- 二、好客的万神殿 147
- 三、道德现实主义优先 165
- 四、老实人：坚忍的享乐者 181

第二篇 与基督教的矛盾

第四章 从理性退缩

- 一、对古代的篡改 198
- 二、对批判的背弃 211

三、神话的修复	221
第五章 异教徒基督教的时代	
一、正本清源	239
二、古今之争：古人派	260
三、古今之争：今人派	288
第六章 可疑的战争	
一、基督教的成分	302
二、教士的背叛	314
第七章 跳出雷池	
一、学术的盗用	335
二、卢克莱修的使命	346
三、休谟：彻底的现代异教徒	374
文献综述	390
主要引用作品	525
索引	529

序曲 启蒙运动的世界

3

一、一小群启蒙哲人

1

18世纪有许多启蒙哲人，但是只有一个启蒙运动。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从波士顿到费城，文化批判家、宗教怀疑者、政治改革者形成了一个松散的、非正式的、完全没有组织的联盟。这些启蒙哲人构成了一个喧闹的大合唱。他们之中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但是令人惊讶的不是那偶尔的噪杂，而是整体上的和谐。启蒙人士统一在一个雄心勃勃的纲领之下。这是一个提倡世俗主义、人道、世界主义，尤其是自由的纲领。这里说的自由包括许多具体形式：免于专横权力、言论自由、贸易自由、发挥自己才能的自由、审美的自由，总之，一个有道德的人在世界上自行其是的自由。1784年，当启蒙运动已经基本大功告成之时，康德给启蒙运动下了一个定义：人类脱离自己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他还给启蒙运动提出了一句口号：敢于认识，亦即，要敢于去发现，毫无拘束地行使批判的权利，要甘于自主自立的寂寞。¹与其他启蒙哲人一样（因为康德只是表达了其他人在论辩中一直提示的观点），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要求把自己当作一个成人，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人。正是这一声明以及启蒙哲人对这一声明的同气相求，使得启蒙运动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4

统一并不意味着众口一词。这个哲学联盟的一个标志乃是启蒙哲人们在哲学和政治信念上的各持己见。联盟有时也因此陷入危机。少

1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全集》（Kant,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Werke），第4卷，第169页。

数——非常少的——启蒙哲人对所接受的基督教教育抱残守缺，另一些启蒙哲人则斗胆转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一些人始终对王权忠心耿耿，激进者则发展了民主理想。法国人在反对教会和国家、争取言论自由和人道的刑法的斗争中，在反对“迷信”的论战中获取快乐，英国的文人则对本国的社会政治体制比较满意。德国的启蒙学者比较孤独而无力，几乎完全回避政治。德国的才子作家、物理学家和怀疑论者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在笔记本中私下写道的：“至少在德意志，一种沉重的税负堵在启蒙运动的窗口上。”¹在那些接触到新思想的意大利邦国，尤其是在伦巴底和托斯卡纳，改革者在公众中拥有一批赞赏者，而且在愿意聆听的当权者中也能获得同情。英国人已经经历过革命，法国人正在为革命创造条件，德国人还没有可能去梦想革命，意大利人则正在借助国家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因此，政治经验的多样性使得启蒙运动具有各不相同的分支；启蒙哲人既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方阵，也不是一个严格的思想学派。如果说他们组成了什么，那也是一种松散的结构，可以说组成了一个家族。²

如果说启蒙哲人是一个家族的话，那么这是一个喧闹的家族。他们是战友，而且常常有深厚的私人友谊，但是，除了以推动共同的事业为最大乐事外，其次就是以批判战友为乐事了。他们彼此展开无休止的论战，有些交往完全是唇枪舌剑，毫不客气。后人对启蒙运动的许多指责——天真的乐观主义、傲慢的理性主义、非哲学的哲学化——最初都是出自他们彼此之间的攻讦。甚至有些从那时就开始流传的误解也是出自启蒙哲人：伏尔泰制造了所谓卢梭崇拜原始生活的谣言，狄德罗和维兰德重复了这种说法；休谟和另外一些人是最早把伏尔泰的优雅机智误解为玩世不恭的。

让他们的敌人幸灾乐祸的是，启蒙哲人把他们自己的氛围搞得极其紧张：朋友关系都很情绪化，争吵时惊天动地，和解时涕泗横流，私事炒

1 阿尔贝特·莱茨曼编，利希滕贝格：格言L88，《格言，1793—1799年》（Christoph Lichtenberg, Aphorismen L88, *Aphorismen*, 1793—1799, ed. Albert Leitzmann），1908年，第26页。（窗户税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税种。——译者注）

2 我将一直使用“启蒙哲人”这个词来指称西方世界各地启蒙运动中的那些人士。